晚清“中兴名臣”彭玉麟的军事思想

■彭万熙

彭玉麟是晚清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书画艺术家，也是中国近代海军的奠基人。彭玉麟自1853年加入湘军水师，因作战勇猛，身先士卒，谋略超群，成长为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在三十多年的水师生涯中，从一个湘军水师营官成长为兵部尚书，在横戈马上、搏击风浪的戎马生涯中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思想。

他敢于清吏治、严军政。晚清政府危机四伏、摇摇欲坠，官场腐败、贪腐之风触目惊心。彭玉麟曾在回复郭嵩焘的书信中感叹：“承示浙中近状，浩叹实深，然不独浙省为然，时事世情，人心宦镜，在目之思之，可忧可怕。”他洞悉到晚清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社会危机，从而提出吏治改良方案。“广求循吏，久于其任，勿以委署为调剂之具，庶不至视官为传舍，而吏治日有起色矣。”彭玉麟不仅重视对州县官员的选拔任用，而且主张加强知府的权力，并要求他们亲君子远小人，慎用幕僚。正如他所言：“得其人，庶足以资佐理，不得其任，即难免受欺蒙。”彭玉麟认为军队士气在作战中非常重要。“士为四民之首，人心风气因之转移。”为此，他选拔和树立德艺双馨、以天下为己任的教官以重塑军纪。如其谏言：“访求一二称职之人，树之风声，予以拔擢，天下闻之，扉然向风，未始非挽回士习之一策。”他还广修忠烈祠，以彰其绩，激励士气。

他乐于端士习、苏民困。彭玉麟透过“中兴”时期“中体西用”“师夷制夷”的背后，看清了腐败的晚清官吏以及社会现象，提出“如购备船炮，广储军火，筹划饷需，似自强矣，而非自强之根本”的思想。可见他并不苟同于洋务派的“借洋自强”的思想，而是主张重内治而自强，自强以御外侮。“能知人而后察吏，能察吏而后可以安民，能安民乃可治内，能治内乃可攘外。”安内必先安民，安民必先端士气。纵观彭玉麟的军事思想脉络，其中不乏为民思想。这与他从小深受传统文化、湖湘文化熏陶以及家境贫困、饱受欺凌而形成的刚介正直的性格有关。我们可以从他写给母亲的家书中得到考证：“近读孟子养气章，觉与军人大有裨益。吾愿私淑孟子至大至刚之气，催坚克敌。”他主张“盖养兵为民，能卫民者，讵忍虐使之。设官亦为民，官不爱民者，何以食禄报君恩。”民生多困，实由吏治多疏。晚清咸丰四年(1854年)冬，因他率湘军水师善战，清廷奖励他白银四千两，他即用于救济贫困家乡。他在给叔父的信中写道：“想家乡有众多苦百姓，正好将此银子行些方便，亦一乐也。”他还向朝廷谏言：“自古富强之策未有不从百姓始。”他力主开地利、兴水利等惠民之举。

他善于选人才、强技艺。彭玉麟说：“惟时际艰难，人才为重，边防疆寄，均关紧要。”他还提出海防人才的特殊要求：“臣巡阅江海水师，与江南提臣李朝斌会议，固在讲求操练有方，尤以留意将才为急，而海防将领更以深明洋务、洞悉夷情以情为先。”他在亲自经历了海防之事后更是向清廷推荐人才：“惟海防水师贵得统帅，尤贵得将才，否则无以相助为理。查有浙江提督欧阳利见、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署福建陆路提督孙开华、瓜洲镇总兵吴家榜、汉阳镇总兵高光效，均身经百战，奋能无前，为水师中不可多得之员。”彭玉麟提出要学习技艺，增造船炮，务求实效，他多次说自己不能洋务，但江防、海防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使他对洋务不得不加以思考并提出自己的方略。他在指挥中法战争时，力荐老将冯子材，并派四支广东军队归冯子材统领入越作战。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威震中外。彭玉麟力主抗战，钦办理广东防务，统筹措置两广军务，为中法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深于重海防、强外交。“重陆轻海”一直是我国传统的军事战略思想。海防薄弱的现实以及两次鸦片战争的教训，让彭玉麟不再抱守这一传统思想。他主张加强海防，特别是要重点防范日本。如其所言：“两广、闵浙，直至天津海防，一气呵成，江海同清，诚为国家大利也。”日本“彼虽小国，而狡狯最甚，前代之患，所以深也。”中法战争之后，针对日本“恃其海上实力，效仿西夷”，威凌海疆，咄咄逼人的趋势，彭玉麟大呼：“及今若不力图自强，大修军政，则恬糠及米，后患何可胜言！”为此，他主张建立强大水师以固国防。彭玉麟构筑了长江水师的总体蓝图，开创了中国近代海军发展的先河。彭玉麟不仅重视军事硬实力，他还非常重视军事外交，他主张“师以曲直为老壮，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在军事外交中，彭玉麟特别强调“非柔不为功”“孚之以诚信”“迪之以中庸”等外交艺术的重要作用。在中法战争中，他首倡“不得已而用兵之故，明白宣示各国，使知其曲在彼，因以携其党而败谋”。他的这一计谋赢得了包括张之洞等名臣在内的诸多赞誉。

彭玉麟从创建湘军水师，身经百战，裹伤上阵，功勋卓著到巡阅长江水师，整顿军纪，督促训练，除贪肃纪，一生为江防海防倾尽了心血。彭玉麟的军事思想涵盖了内治吏治，军纪军备以及海防外交等方面，他的这些军事思想对今天国防和军队建设仍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探寻耒阳书院

■周少鸣

耒阳自公元前221年始置耒县，邑名沿用至今，素有“荆楚名区”“三湘古邑”的美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杰出的人才。汉代有尚书胡腾，龙亭侯、造纸术发明家蔡伦，汉成帝大司农谷永，三国时期九贞太守谷朗，晋代尚书、哲学家、地理学家罗含等等，由于这些名人效应，促进了耒阳文化事业的发展，其中耒阳书院的兴起，就是最好的佐证。

书院是中国古代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者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袁枚《随园随笔》云：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之时。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在长安设立了丽正书院，主要用于收藏、校勘和整理图书。从宋朝开始，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正式形成。宋代最有名的书院有白鹿、石鼓、应天、岳麓四大书院。元明时期书院更为兴盛，专讲程朱之学，并供祀北宋和南宋的理学家。明代无锡有“东林书院”，曾培养了杨涟、左光斗等一批不畏阉党权势，正直刚硬的文人士大夫，他们被称为“东林党”。东林书院留传下来一副有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清代时全国大小书院达2000余所，大部分书院与官学无异。如张之洞在武昌建立的两湖书院、广州越秀书院等。到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诏令全国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至此，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

耒阳书院历史，追溯岁月而上，无论是创立时间，还是教学质量；无论是文化传播，还是思想交流；无论是学术成就，还是人才培养，都是中国书院文化中引人瞩目的地方之一。耒阳最早的书院是杜陵书院，唐天佑四年(907年)耒阳知县朱昂在县城北杜陵处建杜陵祠，创办杜陵书院。据历史记载，书院为四合院封山式。书院正面是藏书楼，一层为砖券窑洞三孔，中辟小板，其顶部为二层孔圣堂的月台。孔圣堂面宽五间，进深三椽，有大小房子十数间。耒阳建杜陵祠及杜陵书院，是为了纪念唐代大诗人杜甫死于耒阳葬于耒阳。《旧唐书·杜甫传》和《新唐书·杜甫传》均记载：“甫客耒阳，游岳庙，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归，令尝牛肉白酒。甫饮过多，一夕卒，遂葬于耒阳。”杜甫死后37年，韩愈迁谪经过耒阳，吊杜甫，写下了“今春偶客耒阳路，凄惨去寻江上墓”的诗句。杜陵书院自唐以来培养了不少科举人才。宋仁宗时期耒阳考取的三名进士，南宋宁宗嘉定年间的耒阳九名进士，均出自杜陵书院。南宋时期耒阳县令王禾在杜甫墓前立有碑刻。1940年，当时的湖南省主席薛岳重修杜陵书院并立有大理石碑，这两块石碑作为历史的见证，目前都保存完好。民国以后，杜陵书院改头换面，相继办有“耒阳县官立第一高等小学堂”“耒阳县立中学”“耒阳市第一中学”等。

白石书院是明朝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耒阳知县马宣带头捐俸修扩庞公祠，并改名为白石书院。庞统是耒阳历史上最有名的县令，三国时期和诸葛亮并称为“卧龙”“凤雏”，具有经天纬地之才。没有耒阳县令这段经历，他也许不可能成为名震天下的名人，从这一点来看，耒阳不愧为风水宝地。耒阳成全了庞统，让他声名鹊起。庞统在耒阳虽然只当了三个月县令，但他只用一天时间将一百天落下的大小案子审理干净，没有一桩冤假错案，让人叹为观止。后人为了纪念他就修了庞公祠。1554年马宣知县改庞公祠为学宫，衡州郡守蔡汝楠(号白石)、工部侍郎翁世资、大仆寺少卿李尚义都支持这件事，三人都写了《重修儒学记》。李尚义赞曰：“吾见耒之人物，与兹学俱新，粹然必协于道，可以为孔孟、为伊周，必自今日始。”后人遂以郡守蔡汝楠的名号改为白石书院。

青麓书院是雍正二年(1724年)知县徐德泰在县城北青龙塔侧创建的。当时的富绅黄定周、李三候、谢彝重、梁子凤等人出资，于当年冬天就建成开学。徐德泰专门写了《青麓书院记》称，且湖以南书院不一，而长则称岳麓，衡则称石鼓，盖以为其为前贤讲学之所在也。吾耒果有奇杰之儒，俊伟之彦，殆将与岳麓、石鼓而并传矣。青麓书院规模较大，可容纳二百生员。书院向全县乡绅募捐学租田，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共有田禾2243担，有田租669石。青麓书院自创立至光绪二十九年废止改为学堂，先后培养出二十多名进士和举人，可谓风光一时。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青麓书院改为耒阳官立第二高等小学堂。民国十五年(1926年)年又设立乙种师范传习所，后来改为耒阳县立初级中学。1928年，耒阳城发生战乱，烧毁了青麓书院。1939年，因侵华日军逼近长沙，湖南省政府迁到耒阳，在青麓书院、文昌阁两处旧址上创办了精忠学校，分设小学部和初中部，以教育随迁的省府官员子弟。直到1944年日军侵入到耒阳才停止办学。2004年，耒阳人梁晓斌、罗湘云等为了弘扬青麓书院的传统精神，筹集资金在其遗址上建设了正源学校，经过近二十年的壮大发展，目前正源学校拥有师生一万多人，成为耒阳市规模最大的私立学校。

紫云书院，嘉庆二十年(1815年)由小水铺士绅曾宏中、曾玉川、谭宪榜、萧文发等发起，在县南黄岗铺创立。

义兴书院，嘉庆二十年(1815年)由仁义十里洞士绅蒋占魁、谢龙章、郭翼之、龙光等人在西乡诗礼洞创建。

仰高书院，同治五年(1866年)由士绅陈耀芳独资在上架桥建立。

淝江书院，光绪初年由当地人资柏丞所建。资柏丞曾经在岳麓书院读过书，与左宗棠、王闿运是挚友，中年后他回到家乡淝江口，在耒河中央一个小岛上筹资建设了淝江书院。清末耒阳才子陈简青年轻时就在淝江书院师从资笃生先生。王闿运曾赞誉陈简青的文章为“美女绣花”。陈简青学有所成，一生致力于办学兴教，曾在耒阳城南创办了广湘中学，成为与蒋啸青齐名的教育家。著名银行家、金融学家资耀华就在淝江书院启蒙。17岁时留学日本，后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工商管理学院进修，回国任北平法学院、中国大学、民国大学教授，为新中国金融学会创始人之一。

1944年7月，日军从衡阳进入耒阳，烧杀掳抢，无恶不作。后窜入到淝江渡口，掠夺民船、架设浮桥，想横渡耒水，国民党军队第26军44师和暂编第二军第八师奉命抗击日寇，在淝江渡口反复争夺，战争极其惨烈，淝江书院也严重受损，大门都被日军飞机炸毁。淝江书院辗转至南阳圩、大水田、文武庙等处办学。抗战胜利后，书院迁回淝江口，在梁家瓦屋祠堂继续办学。解放后，为了支援耒阳剧院建设，书院主建筑中的大量条石、木料被拆除，用船运到耒阳城，只留下遍地瓦砾让后人凭吊。

上世纪50年代末，杜陵书院变成县第一中学，也就是后来的耒阳一中。

探寻耒阳书院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其有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各个时期的书院都制定了一系列独有的颇具特色的教条、学规、学训等，书院的教师则由地方聘请推荐，多为德才兼备的学者、士大夫，书院的负责人叫山长、堂长、院长。书院里的生徒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儒童，准应试生员的学童，紫云、义兴、仰高、淝江书院较多，通过学习，准备考取秀才。一部分是已考中秀才的生员，他们是通过深造准备参加乡试，考取举人，这部分人多集中在杜陵、白石、青麓书院。书院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培养文行兼优的人才，培养官吏的地方，教学内容以经史为主，培养生徒尊孔，忠君。教学方法以生徒自学，自练八股文为主，经师再择要传授精义，修业没有年限规定，直到考中秀才、举人为止。故生徒中，年长者有30多岁，年少者只有十几岁。民族英雄文天祥，1273年任湖南提刑，曾巡视耒阳，作《衡州进士题名记》：按衡进士姓名可考者自祥符省元郑向始，景右八人皆擢第……耒阳居其三，嘉定郡十八人，耒阳又半之。间岁往往多得士。文天祥夸赞耒阳出了很多进士。

进士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地方的最高文化教育水准。那么耒阳到底出了多少进士呢？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耒阳共出了进士47人，其中仅1724年至1901年的177年中，耒阳就考取进士18人，举人42人。这是因为明清时期，湖南文风鼎盛，加之湘军崛起及其对湖湘学子的大力提携，形成湖湘子弟科举考试人才录取的高峰。湖湘学派的形式与发展，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敢为天下先的湖湘学子热血澎湃，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1924年创立的黄埔军校前几期中，有耒阳籍学员高达199人，其中有伍中豪、刘铁超、李天柱等著名革命先烈，这在近现代耒阳历史上，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也确实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耒阳书院的演进与兴衰，从唐代一直延续到清末。它反映出我国古代文化教育的变迁与发展，其作用与意义不言而喻，不但推进了耒阳乃至湘南地区教育文化的发展，还培养了不少人才。其丰富的教育经验和灵活多变的办学形式，至今仍有借鉴意义，成为当下文化活动的重要实践空间，成为对民族精神的一种守护与创新载体，继续传承中华民族文化与精神。

《沼泽深处的女孩》剧照。

《沼泽深处的女孩》：

我遗世独立，但心事浩渺

■龚金平

《沼泽深处的女孩》中的基娅，幼时就失去亲人的照拂，又被小镇居民歧视和排斥，只能生活在沼泽深处，以一种孤独但又淡然的姿态，熬过了生存挣扎，度过了青春成长，甚至收获了人生完满。看起来，这是一个励志故事，基娅像一位隐士，在人迹罕至之处潜心修行，并成就自我。

在基娅与众不同，甚至有些文艺范的生活图景中，影片放大了其中的浪漫与诗意，却忽略了一个不到十岁的女孩，顽强求生的辛酸与困苦。影片甚至将苦捱、苦熬的生存艰辛，美化成超然物外的自在修炼；将人物从大自然中艰难刨食的痛楚，包装成诗意地栖居的安逸。影片回避真切的生存真实，沉醉于封闭自足的沼泽隐居，这对观众来说，无疑像是在熬制一碗有毒的心灵鸡汤。

影片还淡化了基娅取得人生成功的难度。基娅从未受过正规教育，只有塔特短暂地教过她识字。纵然她的艺术感知与生俱来就细腻敏锐，但要成为一名“专家”恐怕也非易事。基娅从未受过绘画和生物学方面的训练，却像是无师自通，连续出版多本生物学方面的著作。影片当然可以讲述一种可能性，但观众仍然想看到情节的现实逻辑，而不是在一种梦幻状态中，让人物成为承载创作者思想倾向的工具人。

影片以一桩谋杀案开始，很像一部侦探片，中间穿插了一场还算精彩的法庭辩论，还让观众看到了“三角恋”的纠结与波折。这样，影片杂糅了多种类型电影的元素，内容比较丰富，似乎能满足观众多个维度上的观影愉悦。但是，这种处理方式也隐藏了巨大的艺术风险，它使影片有多种发展的方向和可能性，但又都不够坚定，诸多类型特征虽若隐若现出场，终究有些苍白甚至潦草，严重挫伤了观众的观影期待。

影片在三个主要人物身上，构建了清晰明朗的人性区分，这种区分我们可以简单地用卑劣（蔡斯）、真诚（塔特）、纯真（基娅）来指称。三人之间的情感纷争具有隐喻的意义，像是三种价值观之间的交锋，像是塔特在忏悔于犹豫、退缩之后，完成对“真诚”的追随，更像是基娅在经历了背叛和伤害之后，如何保持纯真的一种努力。至于蔡斯，他的作用就是提供反衬和刺激，让基娅和塔特见证人性的丑陋，同时也激发他们内心的正直和勇敢。

影片通过人性的高贵与卑劣的映照，不仅可以设置强烈的戏剧冲突，还可以保证影片主题的正面、情感基调的积极。影片的爱情结局，看起来是人物对内心声音的聆听，对情感共鸣的追求，但归根结底只是道德层面的判断与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沼泽深处的女孩》实在是一部比较普通的电影，它的爱情观，它的情感关系走向，已经在大量爱情片中反复上演，并没有令人意外和感动之处。

影片通过基娅的自述，让观众从她的童年开始，一点点接近一个悲苦无助的小女孩。这理应是一个层层揭秘，拨开人物身上的迷雾，让观众洞察生存和人性真相的过程。但是，影片中的基娅并没有为观众提供这种神秘性和欣喜感，她的内心和外表一样，单纯清朗。本来，观众对于她如何独自一人挺过生活的磨难有一定的好奇心，但影片直接跳过了她孤苦伶仃的九年，而是展示她成年之后，如何品尝爱情的甜蜜与苦涩，这使许多情节都有一种悬浮之感。

综上所述，影片在讲述基娅的人生经历时，不仅过于乐观和浪漫，也比较敷衍和随意。影片没有找到能够贯穿始终的核心悬念，而是在一个俗套的爱情故事中，勾勒了基娅直白浅显的爱情选择和内心成长。为了补救情节和主题的苍白，影片只好在谋杀案的侦破上反复渲染，凸显基娅心思的缜密、行为的果断利落、心理素质的强大。但是，随着法庭判决基娅无罪，“谁杀害了蔡斯”这个悬念便一度被搁置，当影片结尾揭露基娅是“真凶”时，不仅给观众带来错愕和震惊，而且基娅的人性面貌也因此变得混沌不明。

影片中有两个重要场景，一个是沼泽地，一个是小镇。这两个地方，一个是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一个是成熟的现代文明空间。在沼泽地，影片大量使用远景和饱和的绿色，来营造一种天高地阔，同时又纯净透亮、明艳动人的牧歌情调。影片还经常通过特写，来强调这片沼泽地那些更为动人的景致，完成对昆虫和鸟类的细致观察。在小镇上，虽然色调也比较明快，但内景比较多（学校、监狱、法庭），人性的邪恶和凉薄更是令人倍感寒冷。那些居民对于基娅作了“污名化”想象，为她添加了许多类似女巫般的猜测和传说，鲜有人对她施以援手。

正因为如此，基娅才会逃离小镇，在沼泽深处自成一体。她的逃离，看似是一种逃避，实则也是在另一个世界深入探询。因为，大自然以一种敞开的姿态，接纳她，拥抱她；大自然像一本深不可测的书本，需要基娅孜孜不倦地去阅读和探索。影片最大的遗憾在于，它未能有力地揭示沼泽地在养育基娅的同时，又如何塑造她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影片常常陶醉于沼泽地的宁静与辽阔，斑斓与神奇，却忽略了这些景致如何在基娅身上打下了烙印。例如，基娅从未对她杀害蔡斯感到愧疚或恐惧，因为在大自然中，清除威胁，远离危险，不过是一种生物的自然本性，是符合天性的生存法则，不该受到指责，更不由旁人来审判。

影片削弱原作《蝲蛄吟唱的地方》中关于基娅对自然界生存法则的认同，看起来是一种高明的改编策略，即突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并利用影像语言的优势，放大沼泽地的壮阔与旖旎。但是，影片无法解决的悖谬在于，一个长期在大自然中独自生存的女孩，身上应该有野性之美，有强悍的生命力和未加驯化和雕琢的质朴感，影片却强调了基娅的温柔、羞涩，以及气质上的平和优雅，甚至她的服装也过于精致时尚。这导致基娅身上并没有体现“大自然本色”，而是让她出落得亭亭玉立，楚楚动人，恬静贤淑。这种人物与环境在气场、性格上的割裂与龃龉，使“沼泽地”在影片中的意义变得空洞而肤浅。

基娅像一位隐士，更像一位斗士，她趟过岁月苦难的河流，在一个个挫折和打击中披荆斩棘，一往无前，最后找到了灵魂的安宁和人生的圆满。影片也像是一则人生箴言，鼓励我们在人生的逆境中遵从自己的内心，忽略外界的冷眼与恶意，守护自我的精神家园，成就丰盈的人生。

本报地址：衡阳市蒸湘区天台路33号 邮发代号：41-18 邮政编码：421001 定价：每年488.00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衡广登字第0002号 广告中心电话：8247111 8243140 发行部电话：8223670
发行单位：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衡阳市分公司 发行方式：邮发 印刷：衡阳日报社印刷厂（衡阳市蒸湘区风顺路10号）